

反萨缪尔森论

上册

□ (美) 马克·林德 著 梁小民 译
□ 上海三联书店



□「美」马克·林德著 梁小民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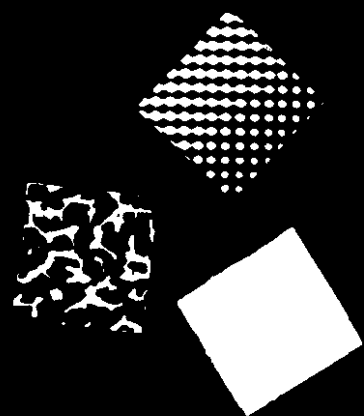
□上海三联书店

反萨缪尔森论

上册



中财 80023450



(沪)新登字 117 号

责任编辑 周瑶明

装帧设计 范岍青

反萨缪尔森论 (上册)

[美]马克·林德 著 梁小民 译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上海分店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江苏常熟市印刷六厂印刷
1992年2月第1版
1992年2月第1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11.75 插页:2 字数:292000
印数 1—2000

ISBN7-5426-0506-2/F·108

定价:11.50元

0021/66

译者的话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 P·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是畅销于西方世界的经济学教科书。它从 1948 年问世到 1989 年为止，曾修订再版过 13 次，被译为十几种文字，发行量达数百万册。这本书全面而系统地介绍了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基本方法与基本理论，较为完整地反映了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全貌。也正因为如此，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马克·林德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分析批判就是以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为靶子。如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分析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也是我国学术界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为此，我们把马克·林德的《反萨缪尔森论》一书翻译出版奉献给读者。

1

《反萨缪尔森论》一书的作者马克·林德是美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60 年代他在普林斯顿大学读书时，曾参加过当时的美国左翼学生运动。60—70 年代美国左翼学生运动的兴衰使他认识到，必须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批判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理论。而学生运动的失败正在于企图“用道德的说教去代替有理论基础的政治的趋势，这也是一般新左派的通病”。1970 年春，他开始对普

林斯顿大学的社会哲学课程进行批评性评论，并发表了一些文章。在这种批判中，他认识到经济问题是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经济学则是社会科学的核心。于是，他决定以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为靶子全面分析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并在小朱丽叶·莎勒的协助下写成了《反萨缪尔森论》一书。该书1974年由联邦德国的波利特拉登出版社出版了德文本(分为4卷)。1977年纽约的欧日森书局出版了该书的英文本(分为两卷)。

《反萨缪尔森论》一书的出版，引起了西方经济学界的广泛注意，尽管对它的褒贬并不一致，但都承认这本书对正确分析资产阶级经济学是很有意义的。美国西北大学经济学教授罗伯特·戈登曾在1977年9月11日的《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反萨缪尔森论〉——来自左派的抨击》的书评，认为这本书“对现代主流派经济学的那种与历史和政治毫不相干的狭隘性是一副有用的解毒剂。”戈登还风趣地说：“依据他的新左派同志的标准来判断，林德先生的书是老式的和教条的……这个说话极为明快的‘马克思’通过教科书40章的各篇与这个结结巴巴而迟钝的萨缪尔森交战。结局比分：‘马克思’为100，萨缪尔森为0。”

2

《反萨缪尔森论》一书共分6编，从6个方面对以《经济学》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进行了系统的分析与批判。

第1编的题目为“基本理论概念”，包括本书第一至第六章，批判的对象是《经济学》第一至第九章以及第三十九和四十章。在这一编中，林德重点批判了萨缪尔森的方法论、市场机制理论，以及有关资本主义社会分配状况与社会三大基本组织——企业、工会与国家——的论述。林德指出，萨缪尔森用“实证”的方法来研究经济问题，实质上是要把“支持资本主义而反对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强加于读者，由此出发就形成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两大特点——

反对阶级观点，反对历史主义。对市场机制与社会组织的分析正体现了这一点。萨缪尔森正是把超历史超社会性的概念作为替资本主义辩护的工具。

第二编题为“危机与凯恩斯主义”，包括本书的第七至第九章，批判的对象是《经济学》的第十至十四章。在这一编中，林德批判了萨缪尔森关于宏观经济学的论述。林德在简要地分析了国民收入核算理论的“折衷主义错误”之后，详细论述了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产生的政治历史背景：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资本主义国家干预经济政策的形成，以及经济学说史上围绕萨伊定律的争论。林德指出，作为宏观经济学核心的国民收入决定理论有这样几个错误：第一、关于投资与储蓄的论述忽略了阶级区分，把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归结为简单商品与货币流通结构”，从而就“用非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来解释资本主义所特有的问题。”第二、“把注意力从决定利润生产与使用的客观规律上转移开来，而仅注意与储蓄和消费，以及与消费和投资相关的所谓决定性的主观因素，”从而“歪曲了而不是再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特点。”第三，乘数原理重复了“斯密教条”的错误，即忽视了不变资本的补偿问题。

第三编的题目是“货币与信用”，包括本书的第十至第十二章，批判的对象是《经济学》的第十五至第十九章。这一编主要是分析批判萨缪尔森的货币与信用理论。林德指出，萨缪尔森把货币作为一种交换的媒介，这就不可能说明货币是“颠倒地在人们的背后所形成的一种社会关系”。而对银行与信用的论述则把“联邦储备制度视为万能的”，扩大了货币政策的作用。林德认为，资本主义的银行、信用与货币制度并不能消灭萧条，更不能消除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矛盾。

第四编的题目是“价值和价格理论”，包括本书的第十三至第十七章，批判的对象是《经济学》的第二十至第二十六章。林德在这

一编批判了微观经济学的核心——价值与价格理论，其中包括供求价格论、边际效用论、成本与收益分析，以及垄断理论。林德指出，萨缪尔森完全接受了边际效用价值论，其目的在于使价值与特定的社会生产过程毫无关系。这种特点体现在成本、收益、市场等问题的分析上就是不考虑“构成现代垄断的生产社会化过程”，“脱离整个经济过程来研究个别企业与商品”。

第五编题目是“生产要素”，包括本书的第十八至第二十二章，批判的对象是《经济学》的第二十七至第三十一章。这一篇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收入分配理论。萨缪尔森是用边际生产力理论来解释收入分配的决定的，即各种生产要素按其边际生产力的大小而获得收入。林德指出，这一理论的基本错误在于“混淆了完全占有自己生产成果的简单商品生产者和资本主义的雇佣工人”，从而为资本主义的剥削辩护。

第六编的题目是“世界市场”，包括本书的第二十三至第二十七章，批判对象是《经济学》的第三十三至第三十八章。林德在这一篇批判了萨缪尔森运用其基本原理对国际经济关系与当前国际经济问题的分析。在这一编中，林德不仅批判了萨缪尔森在汇率、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等问题上的错误，而且还力图摆脱“叙述式”的批判，努力去“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以便在这方面使我们的批判更加完整”。

3

林德的《反萨缪尔森论》一书的篇幅几乎与萨缪尔森的《经济学》相当，像这样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全面系统地分析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巨著到目前为止仍然还没有第二部。这本书对我们正确认识与分析资产阶级经济学也是十分有意义的。

首先，林德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进行分析与批判，并在这一过程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他说，他的目的在于“不是通过抽

决地断言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而是通过说明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解释当今的资本主义，以及资产阶级经济学为什么无法作出解释来证明马克思主义的适用性”。他在本书中的确是努力贯彻了这一宗旨，所以他的分析与批判从整体上看是令人信服的。

其次，林德在分析及批判中抓住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要害问题，这些问题是：第一，脱离生产关系来研究生产力问题。资产阶级经济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经济问题，但却标榜是研究一般经济问题，从而就抹杀了各种社会形态之间的本质差别，否认了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基本矛盾。第二，超历史主义的分析方法。对所探讨的问题不是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研究其发生、发展与消亡的过程，而是静止地就事论事。这种分析方法是资产阶级主流经济学的特征，它们正是用这种方法来证明资本主义制度的永恒性。第三，没有阶级观点。资产阶级经济学或者否认阶级的存在，或者用生产资料占有方式以外的标准来划分阶级，或者用集团来代替阶级。在分析收入、分配、储蓄、消费等问题时用总量分析代替阶级分析，用一般的人类规律来代替各阶级特定的规律。从而，就否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对立，把资本主义社会描绘成一个和谐的社会。第四，用对现象的描述来代替对本质的分析。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罗列了很多现象，对这些现象作了详尽的描述，但对于这些现象背后的本质问题却很少涉及。第五，作为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资产阶级经济学贯穿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赞美。其中心思想正如林德所指出的，是相信“资本主义社会（通过国家）可以解决我们时代的基本问题”。林德正是抓住这些问题来分析《经济学》中的各个观点。

当然，林德对《经济学》的分析批判也并不是完美无缺的。作为一种尝试，既有成功之处，也有不足之处。这些不足之处主要是：第一，有些地方分析欠深入，也缺乏足够的说服力。从全书来看，对宏观经济学部分的分析较为深入，而对微观经济学部分则欠

深入,有些分析批判令人有牵强附会之感。第二,林德也承认资产阶级经济学有其“合理内核”,但对这一点分析得很不够。林德的分析基本上全是批判的,对应予肯定的内容很少涉及。

从林德的分析批判中我们可以得到许多有益的启发。首先,我们应该坚信,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才能对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作出令人信服的分析,而且,也只有在这一过程中,才能发展马克思主义。其次,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批判切忌简单化,不能采用贴标签式的方法。只有掌握西方经济学说史、当代经济理论、经济史、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情况,以及西方哲学、政治学等方面的丰富知识,才能对资产阶级经济学作出深入的、令人信服的分析。最后,在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的错误的同时,也要实事求是地肯定其中某些合理的内容。只在这样,我们才能从中得到某些启示与借鉴。

林德的《反萨缪尔森论》成书于70年代,当时他所依据的是《经济学》的第9版。从那以后,《经济学》一书又有了多次修改,其中第12版的修改最大(萨缪尔森说:“自从作为里程碑的1948年的第一版以来,这个第12版是最彻底的一次修订。”该版中译本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而最新的第13版也已在1989年出版。尽管如此,《经济学》一书的基本体系并没有根本性的变动。因此,《反萨缪尔森论》一书对我们分析批判以《经济学》一书为代表的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仍然是很有意义的。感谢上海三联书店支持该书的翻译出版工作,感谢陈昕同志和其他编辑为此书出版作出的努力。但愿此书的出版能有助于我国学术界对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分析与批判。

梁小民

1990年元旦

序 言

然而，心情平静的交谈要求许多事情；因为许多事情……是与其混乱同时发生的……有一些事情易于引起人心的动摇，而另一些事情又是非常容易打动或煽动人心。在这些易于煽动人心的事情中，我们首先要清算某些邪恶的学说。因此，从人们心中清除这些邪恶的学说是那些当权者的责任，这种清除不是靠命令，而是靠教育；不是靠惩罚的恐怖，而是靠理性的透彻，法律可以用来对付这种邪恶，但法律不是对犯错误的人，而是对错误本身。我们断言……这些错误与大众福利的安定是不一致的，它们部分地通过牧师，部分地通过那些很少在其他地方运用理性而又有足够的闲暇去学习的人的日常讲道而渗透到无知的人们的心中。因此，另一方面，如果有人想引入正确的学说，那么，他就应该从学院开始。在那里，正确的、得到确切论证的文明学说的基础有待于被提出；年轻人一旦被授以这些文明学说，那么，以后无论在私营或公共部门，他们都会以此来教育一般人。而且，通过使他们坚信自己所信仰和教导的这些事情的真理，他们会更高兴而努力地这样做……因此，我认为倡导那

些记载下来的文明学说中的正确内容，并在所有各级学校中用这些正确的内容来进行教育是最高机构的职责。

——托马斯·霍布斯：《关于政府与社会的哲学基础》（1651年）

我们希望，通过经济学的学习，典型的学生对于我们这种混合型经济的功效会有一种新的崇敬——这种崇敬不是来源于熟记标语口号或来源于对其可能的不完善之处毫无所知，而是来源于理论和事实上的理解，从而一旦面临困难而不会有所减弱。

——保罗·A·萨缪尔森等：《经济学》第6版的教员手册，第150页。

对我们这样一本书的需要也许并不是不言而喻的。《纽约时报》在关于保罗·萨缪尔森获得197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金的社论中说：“由于萨缪尔森发展了一个统一的经济活动理论，所以可以把他称为经济学的爱因斯坦。”这样，人们就会问，是什么原因使我们可以与萨缪尔森以及他所如此杰出地代表的科学进行争论呢？

近年来，某种现象引起了各种各样的反应，即出现了“代替”萨缪尔森教科书这一“正统”经济学的各种学说；人们也可能会把我们的批判与这些学说混在一起。事实上，甚至是萨缪尔森本人的书——特别是第8版与第9版——也反映出了这种新趋势。过去10年来困扰着美国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危机在学术界，特别是在学生中已从言辞里反映出来了。萨缪尔森的教科书中包括了诸如污染、种族歧视和军事—工业综合体这些不同的题目，这在本质上是对这种日益增长的认识的一种商业性反应，其目的在于巩固萨缪尔森的书在有利可图的教科书市场上的地位。

初级经济学教科书的使用者一般是那些被迷住的读者，如果

说,他们对被迫购买的书有什么选择的余地话,这种余地也是很小的。但是,他们有否决权,这就是说,如果传统的教科书不能引起学生浓厚的兴趣,关于资本主义的合意的思想教育就无法说服学生,这样,就必须找出新的说明方法。教师在这里可以起到关键的作用,因为教师不仅能为出版者推销,而且他也是能决定什么书“起作用”,什么书不起作用,什么书可以起作用的社会主体。

这就使我们回到了初级教科书的新趋势这一问题上。几年前,当数以千计的学生开始批判他们的社会时,比较明显的辩护性教科书陷入了失去其思想作用,从而也失去其销路的危险。这就要求出现更“适用”的材料。所出现的大部分新书不过是以时髦的方式改写了萨缪尔森的书,不过是占领有失去的危险的市场的商业性努力;但是,其基本的理论与旧模式并没有什么差别。

本书作者经历了60年代与70年代美国学生运动的兴衰。这场学生运动的主要失败之处在于用道德说教去代替有理论基础的政治的趋势,而这也是一般新左派的通病。这种道德说教所采取的形式是企图动员学生代表其他人进行斗争,或者确切些说,由学生本人进行这些其他人的斗争,因为学生是一个有特权的社会阶层,除了这种特权的声誉之外,他们没有自己的战斗。虽然这些斗争的具体性质随有倾向性的集团本身——例如,“第三世界”国家、黑人与其他受压迫集团、工人——的变化而变化,但战略的机制结构本身并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这并不是说,学生在某种重要的意义上说不是一个特权集团。他们暂时摆脱了雇佣劳动的地位,而且他们未来的生活水平与工作条件的前景要优于大部分工人阶级,这些确实是特权(在某种程度上说统治阶级有意地操纵这些特权,以便在“脑力劳动者”与工人阶级的其他部分之间打进一个楔子)。这也并不是说,在反对资本主义斗争的范围内学生不会或不应该从属于其他集团。事实上,本书作者相信,工人阶级应该领导美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否则

美国将没有这种革命。

如果知识分子力图通过装扮成无产者来否认自己的知识分子地位——即除非他们实际上不再是知识分子而成为无产者（在这种情况下问题就不存在了）——他们在社会主义运动中就毫无用处。此外，他们也可以作为知识分子而对社会主义革命作出贡献。

就学生的利益与作用而言，我们应该区分学生作为学生，即他们受教育的时期和他们以后工作的时期。虽然新左派学生运动在纲领与战略中表现出对这个以后时期，特别是对教学职业的明显兴趣，但它本身很少强调作为学生的学生。无论这种失误的原因是什么，把受教育和工作阶段分开必然导致对后者的片面理解与不完善的政治战略，因为未来“思想劳动”的内容要由以前学校的学生来从事，而这些学生要受他们在校经历的影响。因此，如果不在学生还是学生时就努力打破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霸权地位”，要让他们以后的活动以一致的反资本主义观念为指导就不可能。

在当前的学院状况下，内在趋势所起的作用是使学生注意到自己作为个人的主观上的缺点；这与等级的、竞争的、原子式的社会结构是紧密相关的，这种结构给许多学生带来了严重的个人问题。另一种辩护的思路是说，要使理论问题扎根于特殊理论的“纯粹”性或现实的“无限复杂”性。换句话说来说，要告诉学生们，实际上现在对这种差距无所作为，而且，任何宣称对立的理论都是不值得学者注意的简单化的理论扭曲。因此，为学生们调解那些似乎是个人的问题以及资本主义社会之间的关系，并指出资产阶级的理论不能回答这些问题，正是马克思主义的作用。实际上，应该说明在某种程度上资产阶级的理论也在这许多问题的原因之中。

这个把所有这一切联系在一起的过程显然是以学生本身知识动力的大小为前提的。许多美国学生并不把自己作为知识分子，这是美国较普遍的反对唯理智论问题的一部分。就其较正确的内容而言，这意味着怀疑那些无益于人民群众的理论；然而，这种部分

批判的传统可能蜕变为普遍地否定一切理论，其中包括那些能有助于实现人民自己想要看到的社会类型的理论。

具体来说，这意味着在正常的大学权力结构之内，左翼教师最初会经历和所有其他教师同一类型的冷漠和(或)仇恨。这是一个基本的两难处境，只有靠有组织的教师与学生才能集体摆脱这种处境。没有一本书能解决这个问题，而我们这本书也不例外；这本书由于理论“艰深”，内容详细，篇幅冗长，甚至会加重这一问题。因此，这本书可能只适用于那些决心更大的学生(不要把这种学生与“名牌”学校的学生混为一谈)。但是，如果只使用一些有选择的章节，则这本书可以适用于许多人。

在此，我们认为解释这本书的产生是恰当的。开始时是在1970年春天，我企图对普林斯顿大学的社会哲学课程进行一些批评性评论。学生对我们实际上缺乏计划的、甚至是自发的努力所作出的鼓励性的、甚至热情的反应使我们相信，一种更加系统的方法会导致各种课程的竞争和全面的大学教育战略。

我们决定集中在经济学上，我们相信，经济学构成了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为了这一目的，我们批判地阅读了初级课程中所用的教科书。我们的传单——每周读书的简短评论——在演讲中看来引起了少数学生的兴趣。但是，我们在演讲和小课堂上的出现使教育官员——他们没有一个人同情我们——使出一切办法来抵挡这种“政治性攻击”。

如果我们有“平等的竞争条件”——这就是说，如果我们有足够的人去占领所有的课堂——也许我们会更加成功。我们的人数如此之少的事实主要是由于学生的反应，特别是由于一年级新生迷信权威，并且很容易劝他们最好避开那些不是权威的人。

这使我们回到了初步筹备的阶段。我们决定集中在一起并批判地阅读萨缪尔森的教科书；各章的批判产生于这几个学期的笔记。培养学生批判地思考的能力是我们的目的。为了这一目的，

我们努力详细剖析典型的萨缪尔森的推理，这种做法他很难不同意，因为他曾经说过：“我只是感到，每一个字，每一个逗号，每一行，每一页，每一章，都要受到最严厉的批评”（第5版，第Vi页）。

我们的方法有其优点与缺点，就这种方法与沿用萨缪尔森对资产阶级理论的表述这种意图相联系这一意义而言更是如此。主要的优点产生于这一事实：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中固有的方法论的混乱变得日益明显了。潜在的缺点在于由于变得陷入细节之中而有失去概貌的危险。如果读者留心我们的一个要求——在读我们的书之前读者熟悉萨缪尔森的教科书或类似的一本书——那么，就可以避免这个问题。换句话说，本书所要求的前提是，读者像学院的维护者所要求的那样懂得初级资产阶级经济学。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读者应该事先读过萨缪尔森的书，但在看本书的同时读这本书是必要的。让这本书与萨缪尔森“挂钩”的决定是一个与教学相关的决定，它使我们得以集中在经济学的教学上。我们必须选择萨缪尔森的书来进行这种工作是因为这本书在美国的“独创性”和“普及性”，以及它的国际性使用。

显然，我们这本书主要是供已经学过初级经济学课程的大学生和研究生使用的，并不一定适用于经济学专科生；实际上，我们希望社会科学家一般也会使用这本书。对于那些现在正从事初级课程教学的人来说，有批判能力的教师也许可以在准备以后的全部课程时把这本书的一部分用于这种课程。

我们并不否认，我们的书是一项雄心勃勃的事业。萨缪尔森书中的一些观点不时地成为考察各个题目的出发点，因为他所提供的理论背景与经验背景并没有说明他自己的主题，诸如有关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与国际经济学的各章（分别为第八章和第二十三至第二十六章）的情况就是这样。但是，更一般地来说，萨缪尔森令人惊讶的懒散学风支配了他对经验资料的剖析，由于他未能引证出处，未能提供关于文献目录的资料，因此，解剖工作并未变得更

为容易。

我们并不是要扩大对这类经验批驳的意义,但是,我们相信,在第一次批判地看待像萨缪尔森这样的“权威”时,这种批驳是一个很好的背景材料,因为一旦说明了这类伪科学是什么,就会有助于打破学生对理论论述提出疑问的厌恶。这就使我们的批判进入下一个“层次”,我们可以把这一层次称为内在的理论层次;在这一层次上,我们力图通过展开资产阶级理论本身来说明其内在矛盾。最后,我们通过提出对诸如货币、利润、价值、价格、资本、劳动等基本概念的批判来简单地介绍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但是,这仅仅是一种简单的介绍,而不是“全面”的阐述。我们的目的在于:不是通过抽象地断言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而是通过指明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解释当今的资本主义,才能说明资产阶级经济学为什么无法作出解释,来证明马克思主义的“适用性”。

最后,我们要感谢下列同志以各种方式所提供的帮助: B. 斯托尔伯格(S. Stollberg)、P. 克罗索(P. Crosser)、W. 柏林汉(W. Burlingham)、P. 罗曼(P. Roman)、G. 纽林(C. Newlin)、C. 纽舒斯(C. Neusüss)、W. 赛姆勒(W. Semmler)、L. 沃德曼(L. Waldmann)、H. 马特菲尔德(H. Mattfied)、U. 弗德鲁特(U. Forderreuter)、J. 格罗姆鲍斯基(J. Glombwski)以及H. 法斯宾德(H. Fassbinder)。我们尤其要感谢沃尔夫冈·穆勒(Wolfgang Müller)特别依据教学内容对本书许多章和整体结构所作的大量批评性评论。

本书结构概况

为了分析起见,我们把萨缪尔森的教科书分为6个主要部分,这种分法在某种程度上与萨缪尔森所分的6编是一致的。

第一编包括第一至第九章(还有第三十至四十章),可以把这

一编看作是对经济理论本身所关注的某种基本宏观现象的意识形态上的介绍。萨缪尔森在这里所论述的题目实际上是有意义的，而且，设计这些题目的目的是，通过把科学与人们可以合理地预料大学生会从读报、看电视或仅仅是从去商店购物中所获得的前科学知识联系起来为读者做好掌握科学的准备。这些题目论述了萨缪尔森所说的生产及交换的技术基础，劳动与资本这些生产要素所采取的组织形式(工会与工商企业)，以及目的在于补偿市场的不稳定作用的社会机构——国家——的经济职能。此外，萨缪尔森还包括了有关收入(分配)的一章，这一章超出了他自己的框架，是为了在教学中为混合经济进行广告宣传。由于这一原因，我们把这一章与内容相似的第三十九章和第四十章放在一起。

第二编，即第十五至第十四章，反映了“现代”经济学被迫去评论的周期性衰退与停滞问题的严重性，因为，在事实上，形成这几章核心的凯恩斯主义理论的提出，正是这种长期衰退的反应，并又作为国家防止或减轻这种周期性现象的措施的工具。但是，由于萨缪尔森没有讨论这些本质的联系，所以，我们对导致凯恩斯主义产生的经验发展与理论发展进行了分析。同样，我们对国民收入与经济周期理论也提供了某些历史的证明。

第三编，即第十至第十九章，论述货币与信用以及以这些“工具”为基础的国家干预。这些题目以萨缪尔森并未指出的间接联系为前提，因此，提出一种对货币的理论解释就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这是本书中比较困难的部分之一，特别是因为货币理论又要以价值理论为前提，而我们只能以非常简略的形式来阐述价值理论。另一个困难是与萨缪尔森所讨论的信用现象的解释这一事实相关的，这就要求广泛地分析美国资本主义的实际发展。这种分析当然超出了初级理论教科书的范围之外。因此，我们在这方面把理论与实际协调起来的努力就限于某些所选择的内容。

第四编，即第二十至二十六章，起着代替以前被归入“价值理